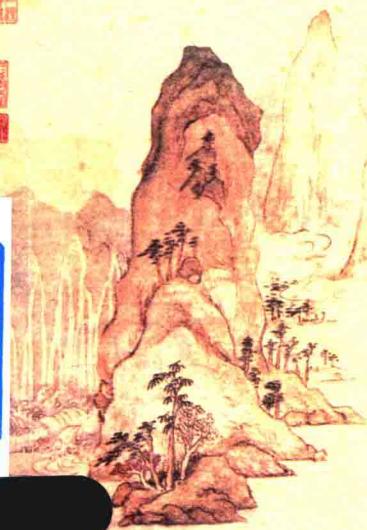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张岂之——著



长春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张岂之——著



长春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 张岂之著. — 长春 : 长春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45-4694-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7526 号

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ZHONGHUA WENHUA DE HUITONG JINGSHEN

著 者: 张岂之

责任编辑: 李春龙

封面设计: 北京·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荣辉图文

印 刷: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13604430875

序

我从自己所写的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稿中选择若干篇，编成这本《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的集子。

尽管集子内有多篇文章，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易传·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我们从中国思想文化史可以看到，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有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的是教化），至两宋，由南宋思想家们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形成，它吸取了儒学和道家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学信条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门讲孝道的佛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

力图使外来的佛教中国化。这样会通的结果，一方面提升了儒学的哲学内涵，另一方面促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思想文化上的“会通”，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这样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儒道佛）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重视理性的独立思考要求。

“会通”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有主、次的内容融合。这种融会贯通是否恰当，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要经过“经世致用”的检测的。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二者密切结合，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不衰。

“会通”包括本土和域外思想文化的交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注意中外文明交流。早在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天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为“西域”。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十三年的艰辛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西域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

威传播到中亚，又由此传到欧洲。张骞开拓的这一中西通道，后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被人们誉为“丝绸之路”。

从中国历史看，中外文明交流是阻挡不住的。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流并未停止。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经过海上丝路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人的祖先。他们为远播中华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要看到，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会通，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流、团聚和统一的过程，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我还想提到，中华文化所用的一些名词术语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不论是儒学还是道家，他们在表述自己思想观点的时候，经常用“自”字。儒学倡导人的自尊、自信、自律、自省等，表现出对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坚信不移。而道家则宣传自正、自化、自定、自胜、自见等，认为事物本来就是如此，人们的认识应当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儒学与道家思想关于“自”的论述和阐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对文化

自信的坚定信念，这在今天和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整理这份文稿，得到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陈战峰副教授的协助，还有长春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努力，我表示感谢。

这本小书出版后，其中的错误、不足，我希望能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指正。

张岂之

2016年7月23日

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

目 录

第一篇 中华文明的演进

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 / 3

第二篇 关于中国古代儒学的研究

孔子儒学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 / 27

儒学与中华历史及世界 / 55

《孟子》与现代人生 / 65

“四书”的文化意义 / 82

第三篇 老子思想研究

我读《道德经》 / 99

老子与《道德经》 / 108

人与自然的和谐 / 123

第四篇 中国学术思想研究

- 先秦哲学关于“天道”与“人道”问题 / 129
-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的理论贡献 / 140
- 《明夷待访录》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 / 163
- 顾炎武《日知录》的学术价值 / 174
- 论中国近代哲学 / 190

第五篇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感受 /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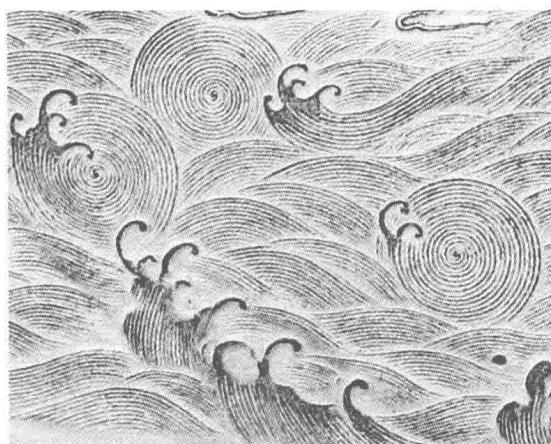
第六篇 中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 / 237
 - 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 262
 - 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 272
 - 我们从中国古代历史中看到什么 / 282
 - 难忘的清华人文教育 / 299
 - 谈“学术生命” / 309
- 后 记 / 312

第一篇



中华文明的演进



人文化成

——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

“人文”一词见于中国的古籍，它不是外来语。《周易·贲卦·彖辞》有这样的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即自然，特别是天象的变化；所谓“人文”即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创立。古人认为，研究“天文”和“人文”，了解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从事农业生产和文明创造，这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研究中华人文精神，首先就要从这里开始。

一、人文始祖黄帝传说的启示

中华民族儿女泛称为“炎黄子孙”，这虽然是一种形象性的譬喻，但是这也给我们以启示，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华人文精神是怎样产生的。

在文字尚未发明以前，我国远古时代的人物事迹，是依靠世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这就难免加上传说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杜撰。因此，研究历史不能完全依靠传说，

同时对它又要有所分析。

黄帝和炎帝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两位著名人物。这些传说后来经过文字加工，保留在先秦文献中。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前145—前90）在他的巨著《史记》一书中说，关于神农以前的事他无法了解，所以不写燧人、伏羲、神农三皇之事。但是他根据某些古文献，和他自己所做的调查相印证，在《史记》中写了《五帝本纪》^①，篇首即叙述黄帝的历史，并涉及炎帝的事迹。

黄帝的时代，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没有明确回答。不过，据当代学者们的研究，黄帝距今约有5000多年。所以，人们习惯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未曾中断的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史。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氏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少典部族原居住在今陕西、甘肃交界处，与有娇氏通婚，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居姬水，炎帝居姜水。有些学者认为，黄帝生于今陕北黄土高原，炎帝生于今陕西宝鸡姜水一带。黄帝部落东渡黄河，顺中条山和太行山朝东北方向发展，直达山西南部黄河之滨和河北一带。与此同时，炎帝部落沿渭水、黄河向东发展，直达河南、山东一带。

在氏族部落的繁衍过程中，炎帝部落与东南的黎族部

^① 关于“五帝”，古代有多种说法。司马迁所记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落发生冲突，炎帝战败，向黄帝求援。黄帝和炎帝联合，与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发生“涿鹿之战”，蚩尤战败。后来，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又发生“阪泉之战”（今河北涿鹿东南），炎帝败北，黄帝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原大地部落联盟的首领。

炎黄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例如：创制部落联盟的制度；观察天文星象，确定历法算数；提倡原始农业；发明医药等等。我们从新石器时代^①的出土陶器上，可以看到某些刻画的符号，这是先民们用来记事的。据文字学家研究，这是文字的雏形。战国、秦汉时期的著作认为文字是仓颉发明的。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的出生地是今陕西省白水县史官村。据考古学家统计，我国出土陶文最多的省份是陕西省。可见，黄帝时代仓颉造字之说并非虚构。文字的发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有了文字，中国的文明创造才能经过文字载体而世代流传。

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发端于炎帝、黄帝时代。在较早的文献中，炎帝、黄帝都是有父母子孙的人，而不是神。他们的贡献是当时先民们的伟大创业精神结出的文明之果。总之，中华人文精神是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培育发展起来的。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的原始农业。

据有些考古学家的研究，距今7000年左右，在长江

^① 据《辞海》（1999年版）“新石器时代”条：“考古学分期中‘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八九千年前。已发明农业和畜牧。……广泛使用磨制石器，能制陶和纺织。……中国各地普遍发现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的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

三角洲地区，河姆渡文化典型堆积的第四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1973 年开始发掘。遗址分四层。以三四层为主，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早期文化），具有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极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和渔猎活动”^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距今 6000 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②系统的遗存——西安半坡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为什么渭水流域成为远古文化发祥地之一获得了有力的证据。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于半坡氏族公社做了深入的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合编的田野考古报告集《西安半坡》，比较完整地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半坡氏族公社的全景。请看，先民们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是：

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也饲养家畜^③；

农业是当时生产活动的主要部门，也是经济生活的基础。……当时种植的谷物是粟，即现在华北盛产的小米。我们发现好几处储藏粮食的例子，尤其是第 115 号窖穴所藏的已腐朽的皮谷达数斗之多。如果没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和一定数量的收获量，是不会有的这

^①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生态环境》。

^② 仰韶文化：距今五六千年，1921 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故名，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第 223 页。

样多的储存的。^①

用于农业的生产工具发现很多，有砍伐树木、开辟耕地的斧、锛，开掘土地的锄、铲，收割禾穗的各种刀子^②……关于耕作的方法，半坡人们可能采用‘烧荒’的办法。土壤烧过后，比较松肥，易于种植；当时地多人少，土地可以轮歇丢荒广泛使用。^③

我们看到这些记载，对于距今 6000 年左右的半坡先民们的生产情况有了具体的印象。除半坡遗存外，在今陕西省宝鸡地区还有 700 处仰韶文化遗存，很能说明问题。按文化堆积、层位特点和碳 14 测定年代数据，宝鸡北首岭下层距今 7000 年左右^④。北首岭中期基本上与半坡早期相同，晚期与半坡接近。北首岭先民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而这里正是炎帝的出生地区。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穡，看来这并非杜撰。至于炎帝和神农氏是否是一人，或是其他，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这里不论。

另外，我们从陕西临潼县附近发现的姜寨遗址，亦可提供证据。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存与西安半坡早期、宝鸡北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第 223 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第 223 页。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第 224 页。

^④ 《中国考古研究》，载《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 5 页。

首岭中期、临潼庞崖相近，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①。其中说：“从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存共出土各类生产工具3811件……约占生产工具总数的22%，仅石斧、石铲、骨铲等主要农业生产工具就有三四百件。”^②

考古资料还告诉我们，从陕北无定河上游红柳河的大沟湾（靖边与内蒙古乌审旗交界处），无定河中游的横山、米脂、绥德和榆林的油房湾、鱼河堡，神木的永兴堡，吴堡的宋家川，以及黄陵县，都有新石器文化遗存。尤其在黄帝陵所在地的黄陵县桥山及其周围，仰韶文化遗存非常丰富。

以上资料说明：炎黄时代先民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

早期农耕物质基础产生了早期农耕文化。文化的产生总是和人的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性思维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步萌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一些仰韶文化遗存中出土了陶纺轮、石纺轮和有孔的小骨针，这说明先民们已开始缝制衣服。他们还知道如何储备粮食（粟）。这反映出先民们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对于自然的巨大威力既感到恐惧，同时又想方设法保护自己，免遭伤害。这一事实的意义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显示出先民们群体保护意识

^①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编：《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14页。

^②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编：《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48页。